

东北大学“985工程”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国有企业改革

绩效评价及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辽宁上市公司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GUOYOU QIYE GAIGE

JIXIAO PINGJIA JI FAZHAN LUJING YANJIU

王世权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东北大学“985工程”建设专项

国有企业改革

绩效评价及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辽宁上市公司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GUOYOU QIYE GAIGE

JIXIAO PINGJIA JI FAZHAN LUJING YANJIU

王世权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评价及发展对策研究：基于辽宁
上市公司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王世权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12

东北大学“985 工程”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ISBN 978 - 7 - 5141 - 1305 - 1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国有企业 - 经济体制
改革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79. 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273 号

责任编辑：李 雪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评价及发展对策研究

——基于辽宁上市公司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王世权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710×1000 16 开 13.75 印张 240000 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1305 - 1 定价：4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回首三十年来的转轨经济实践，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早已明确并一直坚持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就总体和主要思路而言，在“国退民进”这一总体路径下，经历了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但不涉及所有权问题的‘经济分权’”到“以所有权变更为内涵的‘产权重构’”的历程。新千年以来，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攻坚之后，国有企业又以公司治理改革为突破点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活动。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的是一条企业制度创新之路。

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改革正走到关键时期，已经进入由治“标”到治“本”、由“越规”到“合规”的改革攻坚阶段。为了降低改革的初始制度设计成本，必须在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认知的基础上，对进一步的改革路径选择作出恰当的判断，解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到底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存在哪些问题？以后的改革方向是什么？等等。然而，进一步深入、细致剖析截至目前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与建设，不难发现，与实践中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认知不同，理论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由于立论基点的差异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国有企业进一步的发展路径也出现了不同的判断。理论与实践界直面着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科学的判断，并据此厘清进一步发展路径的现实选择。

在上述理论和现实的需求下，本书突破了当前单纯从业绩视角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价的局限，加入制度创新元素，以辽宁



国有企业改革为例，重新评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拟为更好地把握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提供理论支持。

在研究内容上，本书在对已有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对作为非转轨经济国家的英国、德国和日本与作为转轨经济国家的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典型国家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审视了各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经济社会机制，归纳总结了各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与约束条件以及内在机理，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源流及创新发展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依据所构建的国有企业改革绩效模型，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进而指出中国国有企业进一步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以公司治理为主线的制度创新，且应该分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国有、民营与外资的多元互动”与“公司治理制度创新”三个阶段。

本书不但适合于从事企业制度与企业理论教学与科研的广大学者、高级管理人员和政府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等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而且对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的学习也必将有所助益。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2 相关文献回顾	2
1.3 研究的方法与创新之处	7
第2章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比较制度分析	9
2.1 比较制度分析的制度观及其关注的焦点	9
2.2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一式多制与路径分叉	11
2.3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比较制度分析的经验 及启示	69
第3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源流考察及创新发展的 理论解析	76
3.1 国有企业改革的源流考察及创新发展：以公司治理为 主线	76
3.2 辽宁国有企业改革的源流考察及创新发展	91
第4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评价及实证分析	95
4.1 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评价：基于公司治理与业绩双重视角	95
4.2 数据来源与样本公司的数据特征	97
4.3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及实证分析：以辽宁为例	101
4.4 上市公司业绩分析：辽宁的证据	157
4.5 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实证分析	161

4.6	辽宁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归纳与解析	162
第5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以公司治理创新为主线.....	166
5.1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阶段：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	167
5.2	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二阶段：国有、民营与外资的多元互动	179
5.3	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公司治理制度的创新	184
5.4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支持体系	196
	参考文献.....	202
	后记.....	214

第 1 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制度变迁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为深刻的主题。回顾三十余年的转轨经济实践，在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早已明确并一直坚持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从总体和主要思路上看，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的是一条企业制度创新之路。在“国退民进”这一总体路径下，经历了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但不涉及所有权问题的‘经济分权’”到“以所有权变更为内涵的‘产权重构’”的历程（王世权、李凯，2009）。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打破了原有的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样式，使原来处于静止、孤立状态的一些社会阶层及其组织，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逐渐演变为独立的利益集团，企业与社会中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也逐渐转化为多元的利益结构。基于这一系列的现实变化，在多年来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层面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国有企业越来越认识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提高其效率的一条根本途径，国家和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多种政策来加快国有企业改制的规模和速度。

整体而言，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正走到关键时期，已经进入由治“标”到治“本”、由“越规”到“合规”的改革攻坚阶段。为了降低改革的初始制度设计成本，必须在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认知的基础上，对进一步的改革路径选择作出恰当的判断。然而，进一步深入、细致剖析截至目前的国有企业现代

企业制度改革与建设，不难发现，与实践中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认知不同，理论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由于立论基点的差异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国有企业进一步的发展路径也出现了不同的判断。中国的国有企业直面着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科学的判断，并据此厘清进一步发展路径的现实选择。在上述理论和现实的需求下，本书将突破当前单纯从业绩视角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价的局限，加入制度创新元素，以辽宁国有企业改革为例，重新评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更好地把握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选择辽宁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分析对象，其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制度初始禀赋差异，中国国有经济的发展很不均衡，基本格局是南方相对较弱、北方相对较强，东部相对较弱，西部相对较强。特别是地处北方，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国有经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辽宁的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为地区经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顺畅，与民营经济的互动也存在诸多障碍，更高层次的制度创新迫在眉睫。基于此，综合考虑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特点，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对辽宁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价，以此作为参照，解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到底进行了什么程度？存在哪些问题？以后的改革方向是什么等问题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2 相关文献回顾

针对本书研究的内容和侧重点，现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评价”、“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和“国有企业治理及其评价研究”三方面就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

1.2.1 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

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评价的直接研究并不多见，常见于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之中。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运用投入产出等指标来评价。例如，陈宽等（Chen et al.，1988）、刘国光（1988）、董辅初等（1995）运用

“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考察了国有企业效率^①；郑京海（2002）、刘小玄（2002）、阿恩·比格斯腾（Arne Bigsten, 2002）运用数据包络法和 Malmquist 指数法分析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刘小玄、李利英（2005）运用投入产出效率指标测定了产权变革后的国有企业效率；杜大伟（Dollar, 1990）、杰斐逊和徐文艺（Jefferson & Xu, 1991）、李伟（Li, 1997）等运用资源配置效率指标来考察国有企业改革的效率。第二，运用财务会计指标来衡量。例如，诺顿（Naughton, 1995）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生产率的变化下，1980～1996年间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与此不同，刘平（2006）采用每股收益等指标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企业以转让股权、产权方式实施改制后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李钢（2007）则运用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等指标分析了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第三，强调经济与非经济绩效的综合。例如，黄速建、余菁（2006）等研究认为，基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不能仅以经济效率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改革绩效，还要充分考虑国有企业的使命以及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贡献。

可以说，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客观评价，是衡量转轨经济改革成效的关键。基于上述评价方法，结合必要的理论分析，理论界大致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得出了三种判断：一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效率论”（Lo, 1999；Jefferson et al., 1996；林毅夫, 1996）；二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非效率论”（Woo, 1994、1996；Sachs, 1997；樊纲, 1996）；三是“国有企业效率悖论说”（Yoshio Wada, 1998；李培林, 1999）。就当前来看，国有企业在承担着一定经济机能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机能，因此，单纯从经济效率或社会贡献度视角不足以客观地反映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事实上，如果再考虑国有企业改革本身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即便是将经济效率和社会贡献结合起来考察改革绩效，衡量的也仅仅是结果，忽视了过程。

1.2.2 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探索，按研究领域不同，可将已有研究分为五大

^①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也被称为总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是指在产出增长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所解释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因此该指标通常被用以反映国有企业改革对企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类。第一，关于改革方法论的争论：激进式还是渐进式。激进式变革观强调经济转轨应与政治体制的变革联系起来，并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Sachs & Pistor, 1997；科尔内，1992）。渐进式变革规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建设与经济转轨是改革的核心，通过价格逐步放开、国有企业逐步转换经营机制来形成市场的主体与客体（钱颖一，1999；罗兰，2002）。此外，吕炜（2004）基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践，提出了建立以“转轨－转型”为框架的双视角研究方法，樊纲（1991）提出了成本－收益的研究方法等。第二，产权层面的争论：是否应该民营化。这一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如何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认知差异。强调民营化的代表者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模糊，产权主体虚置，国有产权主体整体没有行为能力，因此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是确立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微观产权主体，是改革所有制，此举可带来企业效率的改善。例如，约翰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1998）、拉丰和梯若尔（Laffont & Tirole, 1993）、施密特（Schmidt, 1996）、夏皮罗和威利格（Shapiro & Willig, 1990）、张维迎（1995, 1999）、周其仁（2000, 2004）、樊纲（2000）、梅吉森和内特（Megginson & Netter, 2001）等学者的研究。持相反意见的代表有林毅夫（1995, 1997, 2001, 2005）和郎咸平（2004）等人。例如，林毅夫、刘培林（2001）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自生能力”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除社会性政策负担和战略性政策负担，调整生产活动布局，引进国外资本的改革建议。郎咸平（2004）则强调国有企业的资产属全民所有，产权界定与归属一清二楚，其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创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降低代理成本，建立职业经理信托责任制度。第三，经营层面的争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是“退出”还是“进入”。例如，臧旭恒、徐向艺、杨蕙馨（2005）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沈越（2005）则基于市场经济强调“效率”标准的原则出发，认为国有企业不应该退出竞争性行业。作为国有企业经营领域走向的中立者，贾根良（2005）从演化经济学视角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渐进性的、长期性的，因此国有企业改革要走一条多样化的道路。第四，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重点：内部管理还是公司治理。持管理观的研究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该在管理制度上实现创新，例如，芮明杰、宋亦平（2001）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这两种路径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管理创新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张军、王祺（2004）认为，权威度在各相关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博弈中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正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逻辑线。持治理观的研究者则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该在公司治理制度上，例如，李维安（2001）提出了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严若森（2005）也对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目标模式选择以及相关模式之间的演化路径进行了分析。第五，市场环境建设论。例如，王全斌（1999）认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张锐（2000）指出，运用市场机制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作出新的安排已经势在必行。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一个由国有资本控股的、合乎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的、市场化的生存方式、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公司治理结构国际化、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的“新型国有企业”（刘世锦，1997；剧锦文，2003；赵晓，2005）。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一直以来就是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历史地看，国有企业改革实质上是内生于转轨经济背景之下的。因此，相关理论研究是伴随着转轨进程而展开，并体现出了较强的阶段性特征。时至今日，种种迹象表明，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法论以及经营层面的争论已显得不再重要。下一步理论研究的重点将是“国有企业制度革新的重点应该置于何处？”“特大型国有企业在产权层面如何走”等问题。

1.2.3 国有企业治理及其评价研究

公司治理评价萌芽于1950年马丁德尔提出的董事会绩效分析，随后一些商业性的组织也推出了公司治理评价系统。最早的、规范的公司治理评价研究是由美国机构投资者协会在1952年设计的第一个正式评价董事会的程序，随后出现了公司治理诊断与评价的系列研究成果，如萨蒙（Salmon，1993）提出诊断董事会的22个问题；1998年标准普尔公司创立公司治理服务系统；1999年欧洲德米诺（Demínor）推出的公司治理评价系统；2000年亚洲里昂证券推出的公司治理评价系统；2003年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李维安等推出的“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①。美国机构投资者服务公司（Institutional

^① 这是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的公司治理评价系统，2004年公布“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报告”，同时发布“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数 CCGINK（南开治理指数）”。

Shareholder Services) 还建立了全球性的公司治理数据库, 为其会员投资者提供监督公司治理情况的服务。另外, 还有布朗斯威克 (Brunswick Warburg)、(Institute of Corporate Law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CLCG)、(Information and Credit Rating Agency, ICRA)、世界银行公司评价系统、泰国公司治理评价系统、韩国公司治理评价系统、日本公司治理评价系统 (CGS、JCGIndex) 以及台湾地区公司治理与评价系统等。

上述机构以及学者们对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 大大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理论, 同时对公司治理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正如对国内外评价系统的对比所看到的, 不同的评价系统有不同的适应条件, 中国公司的治理环境及其发展状况与国外有很大的差别 (如典型的 “一股独大”, 与英、美模式不同的监事会等), 因而直接将国外评价系统移植到国内必将产生水土不服现象。只有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中国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制度环境、市场条件以及公司本身的发展状况, 设置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公司治理状况作出准确、客观的评价, 才能正确反映中国公司治理的状况。因此, 中国有必要建立一套全面、系统的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与此同时, 在现有的评级系统中, 最小的考察对象为一个国家, 事实上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区域也有着不同的文化及经济特征, 基于此, 构建一个能够针对一个区域公司特点的、适合于某一类型公司 (国有企业) 的治理评价体系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1.2.4 当前研究的综合评价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及其未来发展路径的探讨, 既为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衡量提供了一定标准, 又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然而, 在已有研究中,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衡量, 大多是基于经济效率或社会贡献度视角, 从公司治理制度层面关注的较少, 这必将不利于深入、科学地衡量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与此同时, 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研究方面, 针对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阶段性特征, 下一阶段理论研究的重点将是那些国有大型企业在产权层面上如何走, 制度革新的重点是应聚焦于管理还是治理, 而这些理论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将都是公司治理问题。另外, 从公司治理评价的角度来看, 现有评价系统中最小的考察对象为一个国家, 并且尚无专门以某一区域内

国有企业为对象展开的评价，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也应成为下一阶段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

1.3 研究的方法与创新之处

1.3.1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基于历史事实、历史经验以及国有企业的实践证据，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着眼点，主要运用了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文献研究方法与案例研究方法来展开研究。

(1) 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评价及路径的最终确定，需要构建必要的理论基础，而理论的产生必须要有经验支持。为此，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与中国公司治理演进的实践，梳理出其中的内在差异及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路径设计的前提与保证。

(2) 文献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是指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需要，通过查阅文献来获得相关资料，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所要研究的问题，找出事物的本质属性，从中发现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是论文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几乎所有的论文，都要先进行文献研究。文献研究法在本书的研究中主要运用于各评价指标的选择上，从而为本相关实证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

(3) 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是通过对一个或多个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案例中的各种信息，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而从中得出归纳性的普遍结论。鉴于现实公司治理事件的风险累积的长期隐蔽性与风险释放的集中突发性的特征，本书注重事前选点与诊断，以抽样和典型案例分析为主，通过个案的长期观察、深度访谈与动态追踪，揭示公司治理的内在机理，分析法律法规制度的演变对公司治理状况的影响程度，探求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

1.3.2 创新之处

本书认为，经过三十年的转轨历程，现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该置于实现公司治理机制创新。因此从研究范式上要实现两个转变：在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认识上，应该由关注结果转变为关注过程；在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选择上，应该从强调结构转变为注重机制。在这一理念基础上，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预期均衡状态作为理想参照系，修正现有约束条件，使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向着最优方向逼近，顺理成章地“倒逼”出政府、社会政策等的修正建议。针对本书的具体研究内容以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主要创新体现在：

创新一：构建了针对辽宁区域特征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并据此对辽宁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价，定量把握了辽宁国有企业改革及其治理状况，在此基础上解答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绩效怎样，存在什么问题，下一阶段的改革路径如何走等问题。

创新二：按照企业的本质→企业目标→公司治理机能→监事会的本原性质与作用机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创新这一思路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融契约性与生产性为一体的一组契约联合网络，其目标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与维系。对此，要求公司治理承担着“对等”的两项机能——“保健机能”和“激励机能”。依此逻辑，监事会的本原性质是通过业务监督与财务监督活动的展开，为缔约者提供了一个减少缔约风险，增加缔约意愿的监督制衡机构的同时，又为以股东为首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参与机制。

创新三：提出了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三阶段模型，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第一阶段是解决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第二阶段是基于“国有、民营与外资的多元互动”来推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第三阶段是以监事会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可以通过引进新的治理主体来创新监事会制度，进而带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整体优化。

第 2 章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 比较制度分析

2.1 比较制度分析的制度观及其关注的焦点

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一系列制度所构成的集合体。制度作为经济体制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其内部的结构方式及相互依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并由此形成了不同国家或社会效率的差异性。近年来兴起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 CIA）方法正是从这一层面对该问题予以关注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建立了关于制度生成与演进的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用来集中分析经济制度的演化与多样性。时至今日，这一方法不仅在经济学，而且在经营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丰富成果^①。

2.1.1 制度观：共有信念、均衡的概要表征和博弈的内生规则

作为制度研究的一种范式，比较制度分析视角下的制度观，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的自我维系系统。认为制度的

^① 本部分主要参考了青木昌彦（2001）以及青木昌彦、奥野正宽（2005）。

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概要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并认为是与他们策略相关的^①。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地再生出来。制度生成之后,不但能够通过协调参与人的信念来引导与控制参与人的行动规则,而且还能够通过节约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处理成本,缩减环境的不确定和复杂性,如图 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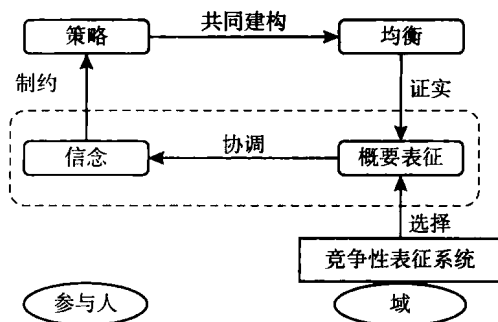


图 2.1 比较制度分析的制度观

资料来源：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第 14 页，作者根据资料整理。

2.1.2 关注的焦点：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问题

比较制度分析将焦点置于经济体制的多样性本身进行研究（青木昌彦、奥野正宽，2005），其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以经济中整体制度配置（Overal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为多重均衡来理解的共时性问题；另一个是把制度视为一种均衡，在承认变化的事实上理解制度演化机制的历时性问题。比较制度分析基于其所关注的焦点来审视一个国家的整体制度安排，认为各国各地区所特有的经济体制、制度及其结构，一方面是以历史的路径依赖性为基础，以过去的和现存的制度为依据的，另一方面又随着技

^① 这种感知也许存在于人们的意会理解中，也许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中。但在任何情况下，某些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并维持，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逐渐生成制度。